

南巡、盐商与清代扬州城市景观的变迁

何 峰*

〔摘要〕 康乾南巡期间,两淮盐商对扬州城市景观变迁产生重要影响并发挥积极作用。两淮盐商是南巡差务经费的重要承担者,为南巡提供了重要的经济、物质支持。因迎銮需要,盐商不但在行宫营建与修缮中积极出资出力,而且主动参与扬州城各类迎銮景观及建筑的营建与修缮。至乾隆南巡期间,扬州城市景观发生显著变化,盐商修建的园亭遍布南巡沿经地区,也成为乾隆帝游赏扬州景观的主要类别,扬州城的景观与文化营建活动达到极盛。盐商对南巡的贡献,得到了帝王的嘉赏,盐商不仅巩固了其专商地位,而且社会、政治地位迅速提升;通过大批园林建筑的兴建与拓展,两淮盐商成为影响清中叶扬州城市景观与文化的中坚力量。

〔关键词〕 两淮盐商;康乾南巡;扬州;景观

两淮盐商多为徽州人,也称徽商,是清代活跃在扬州、淮安地区的主要商帮。两淮盐商的经费支持是南巡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他们在扬州等地主动修建行宫、园林及各类游赏建筑,并蓄养戏班、组织声色娱乐活动,以供帝王赏幸。本文通过对各类文献资料的深入考察,着重讨论南巡、盐商与扬州城市及文化景观变迁的密切关系,揭示盐商通过赞助“南巡”这一重大政治活动,实现对扬州城市景观的全面影响,同时完成自身经济、社会及政治地位的全面提升。^①

一、两淮盐商是南巡差务经费的重要来源

两淮盐商为南巡差务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他们除了向两淮运库缴纳盐税之外,在南巡差务

* 理学博士,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环境科学博士后,100871。

①相关议题学术界有一些初步探讨,如: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对此曾有简单论述,其主要依据《圣祖五幸江南全录》展示了扬州盐商为奉承清圣祖康熙帝南巡进行的一些物质准备,并分析南巡对于扬州盐商在两淮地区商业地位提升的帮助,因作者探讨的重点是徽商群体,因此与南巡相关事迹的资料采集上相对较为简单,并没有对南巡在扬州的具体情况 & 扬州城市在南巡中的景观变迁进行深入分析;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以清代初期扬州文化为研究对象,在涉及到南巡与扬州景点的关系时,作者提出南巡影响了扬州城市的社会构成和文化定位,盐商的地位在南巡中凸显出来,但南巡并不是其著作讨论的重点,因此仅对南巡与扬州城景观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仅作初步探讨。

中还专门捐有公项(即商捐公项),以供地方官员使用。南巡差务包括道路的勘查与修治、行宫及名胜的修缮营建,各类迎銮事宜,各类交通生活物资的筹备等。这些事项在地方上主要由三类人负责,即江浙二省督抚官员、织造盐政官员及商人群体。督抚官员是地方大员,负责南巡在地方上的各类行政事务;织造和盐政官员,多出自内务府系统,与帝王关系较亲近,处理南巡之中与帝王生活相关的各类事宜,成为南巡中与帝王关系最密切的群体;两淮盐政,有时由织造官兼任,掌握着南巡差务经费的重要来源——两淮运库。

南巡公项经费,除藩库银外,两淮运库占有非常重要的比例。因为从盐商那里获取巨大的盐业税收,两淮运库拥有较多的盈余款项。“向来盐政衙门,有赢余闲款银两,存留运库,为各项帮贴杂费之用。昔年皇祖(康熙帝)巡幸,遇有赏赉及办差之需,多于此内动给”^①;“此次随朕南巡人等,虽各有帮银路费俸饷官马,但内地不比边外,诸物昂贵。著总理行营大臣等,将此次随从大臣、侍卫、官员、拜唐阿及留在顺河集等处人员,如何加恩赏给之处,分别定义具奏。其赏银于两淮盐政库贮内动用”^②。南巡的各项支出,多在两淮运库中动用,因此盐政一官,就和督抚官员一样,成为南巡差务中以奏疏的方式,经常就许多政府层面的差务,和帝王进行沟通的官员;地方督抚在很多事务上也需要保持和盐政官员的协商。乾隆二十年(1755年)五月二十三日署两江总督尹继善、两淮盐政普福奏言:“预备各处行宫及名胜之地……经臣尹继善节次奏明,兹臣尹继善查勘各处应修工程,臣普福在镇江相会,将一应事宜又复面为商酌,分别缓急妥协料理,所需经费荷蒙恩旨于运库应解内府闲款银两拨给十数万两。兹臣等公同商酌,查有应解内府生息余利银十二万九百六十两零,又吉安窝利银五万二千三百二十九两零,以上共银十七万三千二百八十九两零,一切备办事宜,均请于此内动用,统俟事竣另开清折奏报,所有遵旨拨动运库闲款银两,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③

此外,南巡差务公项方面,尚有商人专捐款项,称之为“商捐公项”:“兹当巡幸江南,地方官初次承办大差,距皇祖南巡,已四十余年,旧章难于稽考,深虑其办理拮据,或至有累民力。今两淮商人踊跃急公,捐输报效,地方官一应公务,俱于此取给,可信其无丝毫扰累闾阎。”^④

南巡差务经费从两淮运库中动支,或使用商捐公项,这为盐商和盐政官员在南巡差务上的合作提供了契机。两淮盐政、织造中不少人出自内务府,与帝王私交较好,因此成为帝王和盐商之间的中间人。据《圣祖五幸江南全录》记载,康熙帝第五次南巡,自镇江至扬州二十里铺,江宁织造兼管盐院曹寅带领扬州盐商项景元等叩请圣驾。这种合作的基础在于,商人捐款作为公项,盐政等地方官员以此进行迎銮的各类营建,以达到奉承帝王的目的。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盐政高恒奏称,“两淮商人等,呈称世享升平,受恩优渥,明春恭遇省方盛典,行庆施惠,情愿公捐银一百万两以备赏赉等语”,乾隆帝回复“明岁朕恭奉圣母安舆巡幸江浙,一应推恩锡赉,俱经各衙门照例动用正项豫备,第该商等素称踊跃急公,今既抒诚吁恳,情词肫切,着于此内拨银三十万两,交与尹继善办理差务;即赏给两淮二十万两为伊等修理行宫等项之需,酌留十万两以备赏赐;其余四十万两着解交河南巡抚胡宝瑔,备充工程赈恤之用。该商等并着交部议叙,以示嘉奖”^⑤。此次南巡,两淮盐商公项捐款即达一百万两,乾隆帝全部接受。因有盐商作为经济支柱,历次南巡办差,盐政官员都力图超过前任办差官员,“途次建设行宫,不过足供顿宿,原无事过于劳费。乃扬州所建行宫,从前吉庆为盐政时,其缮葺已觉较华,而普福任内,必求争胜于吉庆。今闻高恒所办,则又意在驾普福而上之”^⑥。

①《清高宗实录》卷308 乾隆十三年二月丙寅,《清实录》第十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5页。

②《清高宗实录》卷382 乾隆十六年二月乙亥,《清实录》第十四册,第25页。

③《钦定南巡盛典》卷82《名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01-302页。

④《清高宗实录》卷382 乾隆十六年二月丁丑,《清实录》第十四册,第27页。

⑤《清高宗实录》卷649 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乙卯,《清实录》第十七册,第266页。

⑥《清高宗实录》卷635 乾隆二十六年四月丁亥,《清实录》第十七册,第86页。

二、两淮盐商主动参与迎銮建筑与景观营建

在南巡迎銮中,两淮盐商与盐政官员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仅在行宫营建与修缮中积极出资出力,还主动参与扬州城各类迎銮景观及建筑的营建与修缮,以供帝王巡幸及游赏之需。

因明清朝代更替战争的破坏,清初扬州城许多名胜建筑都已毁坏。康熙帝首次南巡并没有驻跸于扬州城内。直至康熙帝第三次南巡(1699年)后,两淮盐商于原停泊地城南宝塔湾营建高旻寺行宫,及至乾隆南巡,在扬州城核心区域天宁寺营建行宫,扬州城才有了清帝南巡的固定驻跸场所。

康熙四十年(1701年),两淮商人开始在宝塔湾修建高旻寺行宫,“虽不与地方官吏,但工价不下数千”^①,推测此时两淮盐商应已经开始与盐政、织造等南巡接驾官员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方可在筹办行宫这样的大事上成为主要力量。这是两淮盐商在南巡重要事务中第一次集体亮相,自此两淮盐商可直接与帝王进行对话;此后南巡扬州接驾,盐商成为重要的群体。根据《圣祖五幸江南全录》的记载,康熙帝五幸江南,御舟到三汊河,驻跸御花园行宫(高旻寺行宫),“众商加倍修理,添设铺陈古玩精巧,龙颜大悦”,“初四日文武等位早朝,侍卫传旨令各盐商俱进行宫门赏给”,“传旨明日起銮,有盐商并百姓耆老俱赴行宫跪留圣驾再住数天,随传旨再住一天”,“晚朝进宴演戏,其一切事宜,皆系商总程维高料理”^②,盐商料理整个御宴事宜,并且已经可以对帝王在扬州的行程时间施加影响,足见盐商迎銮举措得到帝王认可,此后数次南巡,帝王在扬州城驻跸时间逐渐增长,大致与盐商提供的各类声色娱乐活动不无关系。康熙帝为行宫赐名“高旻寺行宫”,有御制《高旻寺碑记》,称赞众盐商的行为:茱萸湾者,乃维扬俗称宝塔湾也……朕三十八年奉皇太后銮輿偕行,晨昏侍养,视河既毕,勉从舆请济江而南,周览吴会民生风俗,见茱萸湾塔岁久寝圯,朕欲颁内帑略为修葺,为皇太后祝厘,而众商以被泽优渥,不待期会,踊跃赴工,庀材协力,惟恐或后,不日告竣。旧刹式廓鼎新,庄严弘敞,兼以翬飞杰阁,凭高四眺,临大江通南北,因书额赐之曰高旻寺,勒文于石,垂示久远。^③

高旻寺行宫建成之后,宝塔湾虽称有寺,但其寺功能并不完善,甚至没有主持之僧,操持高旻寺行宫事宜的织造曹寅等人在当地延请高僧主持高旻寺^④。因此高旻寺并不像苏州灵岩山、江宁栖霞山行宫那样,行宫依名寺而建,而是寺因建行宫而逐渐完善,并开始在当地寺庙体系中享有一定的地位,并为文人及普通百姓所熟知,大致可见帝王对驻跸地点的选择、盐商“踊跃赴公”的营建,对于扬州部分名胜景观恢复与完善的意义。

因高旻寺行宫僻居城南,南巡从高邮至扬州城,往往先在邵伯镇及扬州城东北北高桥一带停歇,乾隆帝第一次南巡则以小五台为进城前停泊之所。因扬州城成为重点驻跸之地,乾隆帝和盐商都有意在扬州城的核心区域建造行宫以供驻跸,后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第二次南巡之前,择扬州天宁寺建造行宫驻跸之所^⑤。天宁寺地段,东近运河,南面紧邻因盐商靡集而发展起来的新城区,西北近扬州城最有名的风景区一平山堂、保障湖(瘦西湖)一带,至17世纪末,已成为扬州城较为繁华的地段。以城市核心区域为基址,修建扬州城第二座行宫,并延长南巡在扬州城的停留时间,大概可见扬州城在南巡诸城市中地位的提升,以及盐政官员及盐商为迎銮所进行的景观与文化努力对清帝王

①乾隆《江都县志》卷17《寺观》,清乾隆八年刊,光绪七年重刊本,第11-12页。

②佚名:《圣祖五幸江南全录》,汪康年辑,振绮堂丛书,清光绪宣统间。

③乾隆《江都县志》卷17《寺观》,第10-11页。

④《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一辑,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1977年,第97-100页。

⑤《钦定南巡盛典》卷84《名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9册,第325页。

的影响。

除行宫外,清代扬州的许多代表性景观都是盐商在南巡过程中所建。康熙帝曾为劝谕农桑,令内廷供奉绘“耕织图”二十三幅^①。扬州商民即在扬城草河北岸仿耕织图造“杏花村舍”,“竹篱茅舍,颇具野趣”,“艺嘉谷,树条桑,井陌蚕房,恍如图绘”,“视《豳风·七月》殆有加焉”^②。扬州城御道原来从香阜寺至天宁寺,需要走一段旱路。乾隆帝第二次南巡之前盐商新开河道,可直接通舟至天宁寺,“既表敬公之心”,并借口“以工代赈,颇益贫民”,表示南巡景观营建的公益性,以让帝王有更好的理由接受盐商的“敬公之心”。乾隆帝曾特地作诗记述这件事,表示认可,诗曰:“新河十里群商浚,敬上赈贫听岂妨”^③。尽管康熙帝和乾隆帝十二次南巡的时间跨度长达一个世纪,但每次南巡仅二到四个月,而于每座行宫驻跸的时间一般只有几天。大多数行宫考虑到帝王下次南巡依然会再次使用,一般都不作他用,处于闲置状态。长久的闲置必然会使建筑处于自然侵蚀当中,因此需要对行宫进行维护,而维护最集中的时间即是在下次南巡之前的系统修缮。高晋升任两江总督后,即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就行宫修护事宜启奏,称虽然乾隆三十年(1765年)南巡曾一体修竣,但因此前各座行宫修治时间不一,且江南地气潮湿多雨,难保“不无渗漏坍塌”,若不经常维护,恐怕将来所费更多。因此向乾隆帝奏请每年修护维修的费用,其中扬州、金山的行宫及名胜由商人自行办理,苏州府行宫由织造自行办理,其余江宁、苏州、徐州、淮安、常州、镇江等地行宫及名胜“每年看守各役工食等项,并各处粘补修葺约须银二十余万两”,并建议从三十年南巡恩赏银(已存于江南司库)以及水利平市银中动用。^④大致可知两淮盐商则负责扬州城内及镇江金山片区南巡建筑的维护。尽管档案中缺载乾隆帝的批复情况,但大致可知行宫日常维护耗费资金不低。

三、两淮盐商对扬州城景观和文化的全面影响

乾隆南巡期间,扬州城市景观发生显著变化,盐商修建的园亭遍布南巡沿经地区,也成为乾隆帝游赏扬州景观的主要类别。以徽商为代表的各大园亭主人,纷纷拓展其园林,以帝王临幸其园亭作为身份的象征。此外,各大盐商纷纷蓄养戏曲艺人,组建戏曲班子,以满足帝王游赏娱乐的需要。在此过程中,扬州城的景观与文化营建活动达到极盛。

袁枚曾为《扬州画舫录》作序,序文写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描述扬州城的景观变迁:“记四十年前,余游平山,从天宁门外,挖舟而行,长河如绳,阔不过二丈许;旁少亭台,不过匿湑细流,草树卉歆而已。自辛未岁天子南巡,官吏因商民子来之意,赋工属役,增荣饰观,侈而张之。水则汪洋然回渊九折矣;山则峨峨然陞约横斜矣;树则焚槎发等,桃海铺纷矣;苑落则鳞罗布列、闾然阴闭而霁然阳开矣。猗欤休哉,其壮观异彩,顾、陆所不能画,班、扬所不能赋也。”^⑤

扬州城的“文化史”以平山堂为核心,平山堂所在的蜀岗地区是扬州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四十年前应为虚指,大概在乾隆帝第一次南巡(辛未岁)之前,当时平山堂、天宁寺一带,亭台非常少。然至南巡之后,“其壮观异彩,顾、陆所不能画,班、扬所不能赋”,可见扬州城大多数景观营建主要集中在乾隆时期。《扬州画舫录》载“自塔湾河道至馆驿前,南岸有洋子桥、文峰塔、智珠寺、福缘庵。北岸有

^①《国朝官史》卷16《宫殿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7册,第343页;《清朝通志》卷113《图谱略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5册,第518页。

^②《钦定南巡盛典》卷84《名胜》,第328页。

^③《钦定南巡盛典》卷4《天章丁丑江南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8册,第86页。

^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官御档·乾隆南巡御档》,杭州:浙江富阳华宝斋书社,2001年,第1089-1092页。

^⑤李斗:《扬州画舫录·袁枚序》,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9页。

龙衣庵、五里茶庵。河道纤折,南巡多由塔湾,船桥渡至北岸御道至安江门,故是地陆路多胜迹”^①;“乾隆辛未丁丑南巡,皆自崇家湾一站至香阜寺,由香阜寺一站至塔湾。其蜀冈三峰及黄、江、程、洪、张、汪、周、王、闵、吴、徐、鲍、田、郑、巴、余、罗、尉诸园亭,或便道”^②。这些园亭的主人,由姓氏可知,绝大多数都来自徽州府,他们的园亭已经替代了明代之前的扬州景观,成为清代扬州代表性的景观。

江浙地区素来文化艺术生活较为丰富,至乾隆南巡时期达到极盛。《履园丛话》载“梨园演戏,高宗南巡时为最盛,而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例蓄花雅两部,以备演唱”^③。以徽商为首的两淮盐商资本雄厚,为迎接南巡,组织专门的戏曲班子。《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年间,扬州城的盐商为南巡准备大戏,专门在天宁寺搭建戏台,南巡结束后即拆除;后专建重宁寺,以备南巡戏曲演出,并蓄养各类戏曲班底,为迎銮大戏作准备。“天宁寺本官商士民祝厘之地,殿上敬设经坛,殿前盖松棚为戏台,演仙佛麟凤太平击壤之剧,谓之大戏,事竣拆卸。迨重宁寺构大戏台,遂移大戏于此。…昆腔之胜,始于商人徐尚志征苏州名优为老徐班,而黄元德、张大安、汪启源、程谦德各有班,洪充实为大洪班,江广达为德音班,复征花部为春台班,自是德音为内江班,春台为外江班,今内江班归洪箴远,外江班隶于罗荣泰,此皆谓之内班,所以备演大戏也”^④。因迎銮需要,扬州主要盐商都已建立自家的戏曲班子,并形成品牌,各类戏曲门类逐渐形成清晰的风格,并且具有一定的区域特色。两淮盐商为迎銮而建立的扬州曲艺文化不仅在江浙地区独领风骚,至乾隆末年,四大徽班进京,凸显了南巡及徽商所塑造的扬州戏坛在整个国家举足轻重的地位。

帝王在扬州每次驻蹕的时间不过几天,景观与曲艺活动的长期享用是生活在扬州的盐商。南巡事件对于盐商及帝王是一个互惠的过程,帝王享受盐商创造的美景、文娱和礼物,甚至可以带进或引进京城。然而盐商受惠更多,南巡的互动中,盐商的社会政治地位不断提高,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扬州城建造了一批濡染着盐商印迹的建筑和园林,且大多数建筑园林都曾有帝王临幸,并以拥有帝王所赠的题、联、额、诗等御书御笔及各类礼物为身份的象征。“徐赞侯,歙县人,业盐扬州,与程泽弓、汪令闻齐名,家南河下街,与康山草堂比邻,有晴庄、墨耕学圃、交翠林诸胜。毁垣即与江氏康山为一。南巡时,江氏借之为康山退园,故亦得以恭迓翠华,传为胜事,遂与北郊之水竹居并称矣”^⑤。徐赞侯并非是扬州最有地位的徽商,然而南巡过程中,他的园子有幸被总商江春借为“退园”,因此获得帝王的临幸,自此即传为盛事,足见南巡期间帝王的临幸对园林景观及园主人身份的影响。扬州重要盐商的园林,大多曾有帝王驻足,“净香园”是江春别业;“趣园”是黄履暹别业;水竹居,徐世业的园子;莲性寺,原名法海寺,元至正年间僧修,康熙初年歙人程有容等重修;倚虹园,洪微治筑,乾隆帝都曾多次题额、题联、题诗,或赠送藏香、西域香等礼物^⑥。

清初,扬州城因为战乱,名胜古迹所剩无几。乾隆南巡期间,除复建部分历史古迹外,盐商的园林覆盖了平山堂地区。乾隆帝在扬州游赏景观,其诗文内容并不像在苏州、杭州、江宁等城市,以名胜古迹为主,虽也曾因平山堂追溯欧阳修的文化风流,但其诗文吟诵的主体更多是盐商通过其庞大的经济实力兴建的各种精妙园林,以及为迎銮而建的各种建筑景观。

虽然长期的景观营建活动耗资巨大,对盐商的经济实力会有所损耗,但盐商对扬州城的彻底占据却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完成的。盐商因为迎銮,逐渐增强了对扬州城景观和文化的控制。这种控制,除城市物质景观外,也包括景观背后的各种参与力量,如参与艺术创造的雕工多来自徽州、宁国、

①《扬州画舫录》卷7《城南录》,第163页。

②《扬州画舫录》卷1《草河录上》,第3页。

③钱泳:《履园丛话》卷12《艺能》,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32页。

④《扬州画舫录》卷5《新城北录下》,第107页。

⑤《扬州画舫录》卷14《冈东录》,第333-334页。

⑥赵之璧编纂《平山堂图志》卷2,清乾隆三十年刊,光绪九年重印本,第81-128页。

苏州等府,以及在景观中提供娱乐活动的艺人的蓄养等等。

四、两淮盐商的南巡收益

南巡期间,两淮盐商的“踊跃急公”并非仅仅为了“急公”,这与明清盐业政策相关。盐商希望通过南巡迎銮,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而巩固其专营、专商地位,提升其政治与社会影响力。

“明万历四十五年,两淮盐法疏理道袁世振以积累引日多,乃师刘晏纲运遗意,创行‘纲法’”;清承明制,“各省行盐,循用纲法,招商认窝领引办课,引从部发,谓之部引,岁由各运司具文请颁,于开征时由商人按引纳课”^①。王振忠对两淮盐商与南巡的关系有过研究,认为南巡期间,两淮盐商捐助钱款数量巨大,因此“政府既受此巨贿,势必难以更换新商,于是‘引窝听商得自为业’”,较之晚明,清代淮扬徽商专擅两淮盐利日益严重^②。

事实上,乾隆帝历次南巡都在盐业政策上对两淮盐商有许多倾斜。乾隆十六年(1751年)谕令“朕省方所至,广沛恩膏。前因两淮商众,踊跃急公,业已加恩优奖,更念其运纲输课,接济民食。恤商斯足以惠民,特行再布殊恩,著将两淮纲盐食盐,于定额外,每引赏加一十斤,不在原定成本之内”^③,即每引直接赠送给两淮盐商十斤。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南巡,再次有“每引加赏十斤,不在原定成本之内,以二年为限”之谕^④。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南巡,“朕此次南巡所有两淮商众,承办差务,皆能踊跃急公。宜沛特恩,以示奖励,其已加奉宸院卿衔之黄履暹、洪徵治、江春、吴禧祖,各加一级。已加按察使衔之徐士业、汪立德、王勛,俱著加奉宸院卿衔。李志勋、汪秉德、毕本恕、汪焘,著各加按察使衔。程徵荣,著赏给六品职衔。程扬宗、程均、吴山玉、汪长馨,俱著各加一级”,同时纲盐依然“每引加赏十斤,不在原定成本之内,以二年为限”^⑤。两淮盐商除了享受盐业政策的优惠之外,且都加以各类官衔,且因南巡差务贡献之大小,两淮盐商的身份有了明显的等级之分。乾隆三十年(1765年)南巡,两淮盐商照二十七年职衔,再次各加一级^⑥;四十九年(1784年)南巡,两淮盐商“未完提引余利银一百六十三万二千七百七十四两零,著加恩全行豁免”^⑦。由此,两淮盐商在南巡办差的过程中,获取更多盐业政策上的优惠。乾隆南巡赏赐各主要盐商官衔,有利于两淮盐商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提高,虽然是荣誉职衔,但却在与盐政及其他往来官员的交往中拥有平等对话的权力,在地方政治舞台上,两淮盐商逐渐拥有一席之地。

乾隆帝对两淮盐商的赏赐和政策倾斜势必会让两淮盐商的经济实力得到增强,而其他地方的商人,也积极参与南巡事务,乾隆帝对他们也有赏赐,但远不及两淮盐商。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赏赐两淮盐商之后,对浙商也给予盐引优惠,“浙商亦有承办差务,巡省所至宜一体加恩,以敷庆泽。著将嘉、松、宁、绍等所,运销引盐,每引各加五斤,以一年为限,俾民食足而商力纾,称朕恤商爱民至意”^⑧。浙商所加盐引及优惠时间都不及两淮盐商,应与商人在南巡差务中的付出直接相关,大概可以反映南巡影响下的江浙二省各商帮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

①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1页。

②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第11-12页。

③《清高宗实录》卷383乾隆十六年二月甲申,《清实录》第十四册,第32页。

④《清高宗实录》卷532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乙丑,《清实录》第十五册,第703页。

⑤《清高宗实录》卷654乾隆二十七年二月戊寅,《清实录》第十七册,第326页。

⑥《清高宗实录》卷729乾隆三十年二月壬辰,《清实录》第十八册,第25页。

⑦《清高宗实录》卷1199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壬午,《清实录》第二十四册,第37页。

⑧《清高宗实录》卷656乾隆二十七年三月甲辰,《清实录》第十七册,第37页。

五、结语

两淮盐商是南巡差务经费的重要来源,除了向两淮运库缴纳大量盐税之外,盐商们专门捐有公项经费,以供南巡差务使用;此外,盐商们为了迎銮,主动在扬州等主要南巡城市进行了大规模景观与文化营建,成为南巡差务中非常活跃的角色。通过这些举措,两淮盐商拉近了与帝王的距离,并逐渐可以影响帝王南巡在扬州城逗留的时间。这些举动得到了帝王的嘉奖,两淮盐商因此享受到更多盐业政策倾斜所带来的实惠,进一步巩固了其专商地位;同时,南巡的过程是两淮盐商政治社会地位逐渐上升的过程,在乾隆南巡时期两淮盐商的社会影响力达到极盛。

伴随着南巡的进程,扬州城从清初的荒芜及国家的疏离,发展成为南巡力量及国家力量对江浙地区景观影响最集中的代表。扬州在南巡城市体系中地位逐渐上升,这种上升与扬州以“盐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功能,以及盐政官员与两淮盐商通过南巡迎銮与政府之间逐渐亲密的关系有关。在这个过程中,扬州城完成了自身景观变迁的历史,城市文化景观在这个过程中全面复兴、达到鼎盛。除了帝王行宫及各类游赏建筑之外,“盐商”影响下的园林景观覆盖了扬州城的主要风景区,并由于帝王的临幸,作为园林主人及景观建造者的盐商得到文化身份的彰显,而这种发展的结果也成就了清中叶两淮盐商对该城市景观文化的绝对控制。

(责任编辑:蔡道通)

Yangzhou Salt Merchants and the Change of Yangzhou Urban Landscape during the Southern Inspection Tours of Kangxi and Qianlong

HE Feng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role played by Yangzhou salt merchants in the formation of Yangzhou's urban landscape during the Southern Inspection Tours of Emperor Kangxi and Emperor Qianlong. First, those merchants provided enormous material support for the imperial inspection tours. Second, they constructed a series of landscape and buildings besides palaces for the emperors to enjoy their tours in Yangzhou. Third, during the southern tours of Emperor Qianlong, the landscape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Yangzhou reached its peak, thus changing the city's outlook fundamentally. Because of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success of the emperors' southern inspection tours, the merchants enhanced their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tus, and thus had a great impact on landscape and culture of Yangzhou City in the mid-Qing Dynasty.

Key words: Yangzhou salt merchants; Southern Tours of Kangxi and Qianlong; Yangzhou; landscape